

朱清时 主 编
李传玺 执行主编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梅贻琦

卷

徐迅雷 编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朱清时 主 编
李传玺 执行主编

梅贻琦

卷

徐迅雷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 梅贻琦卷 / 徐迅雷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36-8113-5

I. ①现… II. ①徐… III. ①高等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6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第 210977 号

现代大学校长文丛·梅贻琦卷

XIANDAI DAXUE XIAOZHANG WENCONG MEI YIQI JUAN

出 版 人:郑 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统筹:王 骏 钱 江

责任编辑:徐家莉

装帧设计:阮 娟

技术编辑:王 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1,63683013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19.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一个日子。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戊戌变法失败了。一边是慈禧再度“训政”,一边是废黜光绪,废除新政,对倡导变法维新人士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其中独有一项“成果”经过一个老人的巧妙运作保留了下来,那人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那“成果”便是京师大学堂。

也许是经过变法者心血与鲜血的滋润,这粒中国现代教育的种子开始了它的倔强生长。

至1949年,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包括大学教育体系以及它的格局、架构已基本形成。

由此,人们常常发问: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袁氏复辟,走马灯式的北洋政府;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水深火热几不聊生;外敌入侵,十四年抗战,虽取得胜利,接踵的又是国共内战。如此时空背景,常常使课堂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却能够生长,且健全了各门类基础学科,诞生了一批名校,培养出了惠及后世的大量杰出人才,在教学相长过程中走出了大批大师

级的教育家、科学家、思想家。为什么？

钱学森先生曾这样发问。

每个人一说到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时，总会想到蔡元培先生，总会想到西南联大，更会这样发问。

二

2010年3月14日下午，首都机场。全国两会结束，各地的政协委员返程。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正坐在过道边的椅子上。那段时间，他是热门人物，一直被媒体包围着，此刻他好像很累很疲倦，但仍有记者不停地同他说着教育的热点话题。作为安徽政协委员向中央报送信息的联络员李传玺也站在旁边听，并不时对朱清时先生切中肯綮的评论报以由衷的赞美。

“你是哪家报社的？”朱校长问李传玺。

《江淮时报》副总编常河先生站在旁边，向朱校长介绍了李。

“噢，你研究胡适啊，我对30年代那批大师，尤其是那批大师级的教育家非常佩服。”

这句话也埋下了一粒种子。

2012年初，时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就职的王骏先生询问李传玺，今年有没有好的选题。

李传玺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了在首都机场与朱清时校长谈话的画面，以及朱先生最后的那句话。何不请朱清时先生担纲编选一套现代大学校长文丛？王骏向社领导做了汇报，很快得到了同意。可朱清时校长能同意么？初春的一个下午，李传玺拨通了朱清时校长的电话，虽然天气不热，却紧张得一手心汗。没想到朱校长听完了介绍后，欣然同意。

于是有了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书。

让我们倾听一下那些大师们的声音。声音都不是那种激昂慷慨式的，很平和，却更入灵魂。

蔡元培先生：“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张伯苓先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蒋梦麟先生：“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学校之惟一生命在学术事业”，“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畀以学术自由之权，所以求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发展，不受外力阻挠也”。

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胡适先生：“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们可以替全国训练将来的师资和工作人员”，“只有在自由独立原则之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

竺可桢先生：“科学精神就是求真，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

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

不需要再引了,读着这些话,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也许自会得出本文开篇所提疑问的答案。即使不是,你也会强烈感受到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教育胸怀。此书还选收了大量大师们其他方面的论文甚至美文,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充分领略到大师们多面的风采。

李传玺

2015年3月

目 录

导读

- 1 大学·大师·大楼
——梅贻琦和他的教育思想

第一辑 大学之精魂

- 15 大学一解
25 就职演说：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28 大学的意义及学校之方针
30 教授的责任
32 致全体校友书
40 关于校内集会的意义
41 关于“一二·一”惨案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44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为母校遭受枪击
屠杀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
50 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

第二辑 大学之人文

- 61 在昆明公祝会上的答辞
63 赠别大一诸君
65 学问范围务广
66 体育之目标
67 关于体育比赛
68 论“拖司”
69 校际体育比赛

70	灵敏之脑力寓寄于健全之体魄
71	体育之重要
72	在 1932 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74	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76	关于学生参加救护伤兵事
77	在建校二十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79	在 1933 年度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82	致新来校的诸同学
84	形势与秩序
	——在 1934 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86	在建校二十四周年纪念典礼上的讲话
88	回顾与前瞻
	——在建校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91	在建校二十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92	关于各处学生来校借读及上海战争问题
93	提倡吃苦耐劳精神
94	巡视考场时对记者的谈话
95	关于中英学术交流
96	在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
98	民主自由与学术自由
99	对战后清华发展之理想
100	《清华同学录》序

第三辑 大学之理治

103	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
106	清华发展计划
107	清华学校组织大纲
111	国立清华大学规程
116	评议会

117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议事细则
119	教务长、院长、系主任职权分际之规定
121	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
128	职员服务规程
130	本科教务通则
136	清华一年来之校务概况
150	关于组建工学院等问题
152	毕业生的职业指导
153	请拨圆明园遗址俾充农场及院舍的呈文
155	关于举办特种研究的呈文
157	关于航研所事
159	关于“特研所”事(一)
160	关于“特研所”事(二)
16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
165	西南联合大学教学、行政机构系统表
167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拟办呈贡县试验 工作大纲、目的及办法

第四辑 大学之史记

171	抗战期中之清华
176	抗战期中之清华(续)
180	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
185	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
190	抗战期中之清华(四续)
197	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
203	复员期中之清华
206	复员后之清华
211	复员后之清华(续)
242	给西南联大电讯专修科的题词

243	关于联大校舍被炸的启事
244	记录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暗杀的日记
24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249	致“特刑庭”的公函
250	1941 年日记选

大学·大师·大楼

——梅贻琦和他的教育思想

徐迅雷

大学·大师·大楼
——梅贻琦和他的教育思想

A

时光在生命的沙漏里，终于渐渐漏尽了。1962年5月19日，73岁的梅贻琦先生，不幸被死神所捕获。因为罹患癌症，在台北的台大医院，他告别了人间，告别了清华，告别了爱他、他爱的亲人们和师生们。

1889年岁末，梅贻琦出生于天津。19世纪末的中国，是个神奇的时代，社会风雨飘摇，却诞生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那时的梅贻琦呱呱坠地，当然不知道百年后中国的风云激荡，更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只干了一件事，而且把这件事给干成了——把清华带成世界级的大学。

没有梅贻琦，就没有今天的清华，就没有那样让人流连的西南联大，就没有中国教育史上曾经高耸的那一座丰碑。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永远的老校长”。他是一支红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是一个燃灯者，灯尽油干火不灭；他是一位播火者，薪火终归要相传。

梅贻琦，字月涵。贻琦亦奇，月涵涵人。梅贻琦的先祖曾受命驻防天津卫，“天津梅氏”渐而发展成望族，“一门之内，孝友著闻”。然而到了清朝末年，梅氏家族衰落，生活陷入困顿。

庚子之乱，梅家遭殃。1900年，11岁的梅贻琦跟随父母，一度从天津逃到保定避乱。他可能没想到，8年后的1908年，自己会到保定高等学堂求学，接着就与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结下不解之缘。

梅贻琦是在15岁上，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之下，才得以进入南开学堂的。天资极其聪颖的他，学业成绩优异，颇受张伯苓校长赏识；南开学堂毕业后，他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这位“大一学生”，次年就参加了首批留美学生的选拔考试，在47个录取学生中，他考了第6名，1909年10月“放洋至美”，赴美国吴士脱工科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

1915年，学成归国的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半年后，应清华之邀前赴任教，从此他成了真正的“清华人”，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清华母校。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首席教授；1926年，他被全校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年，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自此，清华完成了从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的三级跳，当时的校长为国民政府派来的罗家伦。1928年11月，因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财务混乱，梅贻琦被派往美国，二度“放洋”，担任监督。

始创阶段的清华大学，校长连续易人，局势动荡不安，不受欢迎的校长甚至连校门都进不了——师生们坚决不要那样的校长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口碑甚佳的梅贻琦，于1931年岁末奉调回国担任校长，担当了“救火队队长”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梅贻琦，清华大学从此开创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斯为清华，庐为清华，他成了当之无愧的“清华第一人”。

C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就职演说中的一句名言。大学、大楼、大师，通过这句话中的三个关键词，梅贻琦清晰而形象地说出了三者的关系。后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只有大师没有大楼，充分证明了这句话的杰出。

那个时代的教育，正是把内在的“大师”放在第一位，所以培养造就了众多的大师——这大师既包括学校吸纳的教授，也包括学校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而在今天，总是把物化的“大楼”搁在最中心，所以几十年过去就有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对于办大学的目的，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讲得很明了：“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研究学术”需要大师，“造就人才”也需要大师；“研究学术”研究出大的成果就成了大师，“造就人才”造就了杰出毕业生最终他会成长为大师。

为了抵达这两个目的，梅贻琦施行的是通才教育、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

通才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如果说在 1931 年的就职演说中，梅贻琦还是侧重于提出造就有用人才、注意用好人才的话，那么，在领导清华大学以及西南联大 10 年之后的 1941 年，梅贻琦在他的经典名篇《大学一解》中，清晰地揭示了“通识授受之不足”，指出大学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

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通才的培养，具体有赖于通识的教育，“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在今天来看，大学本科四年尤其是前一两年侧重通识教育，研究生阶段注重专识教育，已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在梅贻琦那个年代，这样的识见殊为难得。而“大师”显然不是依靠大学四年的通识教育所能造就的，所以，对于专才——即“事业人才”的培养，梅贻琦说得很清楚：“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在”，一曰大学之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

好的教育理念，是造就好的大学的基础。作为一校之长，梅贻琦通过民主管理，亦即教授治校，使清华大学得以顺治、发展和兴盛。

梅贻琦是教育的实践家，说话不多，人称之为“寡言君子”，真可谓“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梅贻琦的民主理校，用他的一句话三个字来说，就是“吾从众”，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组成的管理体制。

“吾从众”不是盲从无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用现在的一个俗词来说，就是“集思广益”。今日有太多的假民主，“认真听取，绝不采纳”，这样弄久了，教授们再也没有“治校”的想法和举动了。无论是管理一个学校，还是管理一个地方，或是管理一个国家，民主管理和专权管制，都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理路，其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时至今日，行政化、级别化的大学校长，绝不可能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倒倒茶的”了。现在任命校长，也只有“权主”，而没有民主。

梅贻琦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惜乎后来没有了梅贻琦的清华，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还真是成了“专科学院”了；而“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自然也就荡

然无存了。

学术自由是造就大师的前提。唯有民主,才能带来自由;学术若无自由,繁荣则没希望。梅贻琦毕竟是留美归来的校长,潜移默化中受到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浸淫与洗礼。在《大学一解》里,他这样阐述学术自由:

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

一个文明的社会,尤其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教育,就应尽可能地为个体提供自由与发展的条件。若连学术研究、思想、思考都没有自由,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自由的?当今的学术是行政化、项目化的,科研需要官场的立项审批,才能拿到经费,遑论“自由”之境。

威权管制、失去自由自主的教育,不是教育的进步,而是教育的倒退。梅贻琦时代的教育思想、教育管理,今日只能望其项背了。

D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寡言君子”。同样是大师级的校长,和蔡元培、胡适不一样,理工科出身的梅贻琦,不仅仅是平常说话少,而且也不太喜欢“下笔千言”,所以并无“等身”之

著作。在我家的书柜上,《蔡元培全集》是长长的一排,蔚为壮观;胡适的各种文集、著作,更是汗牛充“柜”。除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日记,梅贻琦先生的文章目前能收集到的还不足二十万字。他的写作习惯,就是坚持不懈地认真记日记,他的字很好,思维很清晰,表达很准确,可是日记毕竟像今天的微博,以精短为特色。早年的日记稍长,而晚年在台湾的日记,大多精练至一两条、两三条微博的长度。

梅贻琦说话不多,但出言往往幽默;梅贻琦著作不多,可思想处处闪光。与浪漫诗人胡适先生不一样,梅师贻琦的文章,非谓“花动已是满山春色”,而是集中于教育这一主题,仿佛整个山谷都是单纯而美丽的百合花。

本书作为《现代大学校长文丛》之一,编者思忖再三,将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大学之精魂、大学之人文、大学之理治、大学之史记,这四个部分各有侧重,但主题词只有一个——大学,核心也只有一个——教育。大学之精魂,说的是大学的精神与灵魂,其领衔之作,就是《大学一解》以及就职演说;大学之人文,侧重于体育人文等内容,这是广义的人文概念;大学之理治,是相对具体的有关学校管理的篇章,并附录了部分规章制度;大学之史记,侧重收录梅贻琦先生的回忆性文章,尤其是抗战岁月的办学回忆,另外就是“窥斑见豹”地选录了他在西南联大若干个月的日记。梅贻琦的教育思想融会贯通于各个篇章,这四个部分也是大致的划分。

需要说明的是,梅贻琦有一两篇著作,是他提出主题、提出思想、提出框架,由“秘书”潘光旦执笔成文的。《大学一解》就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夜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拟就的文稿;1943年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同样是由梅贻琦拟纲,潘光旦代笔。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成为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

在选编《现代大学校长文丛·梅贻琦卷》之时,作为选编者和此篇序言的作者,我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有关梅贻琦先生的书籍。好在热爱清华的梅贻琦,将文章大多刊发在清华大学的校刊学报上,得以保留下来;而